

1955—1971年的 中美关系

——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
克制的再探讨

主编：姜长斌

[美] 罗伯特·罗斯



国防大学 2 064 9887 8

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

——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

主编 姜长斌
[美] 罗伯特·罗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合作研究项目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5—1971 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姜长斌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ISBN 7-5012-0943-X

I. 19… II. 姜 III. 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55—1971-文集 N. D829.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730 号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杨志芬
孙 敏
尧 阳
苏灵芝

出版发行
地址电话
邮政编码
排版印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版 次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65232695
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60 千字数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5—1971

A Re-Examination of Cold War
Conflict and Restraint before
Bilateral Détente

edited by
Jiang Changbin and Robert Ross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C. P. C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写在前面

姜 长 斌

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中美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这一项目的双方主持单位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我首先要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汪家镠常务副校长、副校长刘海藩教授、副教育长王瑞璞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埃兹拉·沃格尔）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尔比教授。他们始终关怀并支持本合作项目。我还要感谢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给予本项目的经费资助。

本项目参与者的初始愿望是：为了加深相互了解，为了推进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双方有必要根据双方最新的资料文献及对历史的反思，对冷战时期的中美冲突与克制进行较深层次的再探讨。邓小平先生说过：“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①——这首先是中方研究者的指导思想。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②同样也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共识。这本书虽然是论文集，却是放在国际大格局

和双方各自国内形势变化背景下，撰写的 1955—1971 年相当系统的中美关系断代史。采用论文集的形式发表，既能最大限度地表达中美双方学者的一致观点，又能保留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认识上的差异，这可能也更便于广大读者，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分析、对比与判断。

为什么是 1955—1971 年的关系史呢？一是，因为在此之前双方学者已经进行过一次合作，对 1945—1955 年的关系史共同研究过，并且在中美两国以中英文发表过一部论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③二是，我们在 1995 年春双方商讨合作项目时，美国政府把 1971 年以前的大部分官方档案予以解密，可资研究者共同利用。在此期间，中国也发表了许多新的资料文献。

当时，美方项目主持人罗伯特·罗斯教授正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在我国外交学院讲学。我们共同商讨的结果是，从 1955 年到 1971 年，中美两国之间最重大的子课题有四个：一、50 年代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二、越南战争；三、大国格局变化中的中美关系；四、60 年代中美两国国内局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重点应是对中美两国从冲突与克制走向缓和的诸多因素的再探讨。双方各自组成课题组，就以上四个子课题分别进行对应研究。中方课题组主持人由中共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担任，成员都是国内有关研究领域中的中年专家，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积累有丰富的史料。他们依次是：中共中央党校宫力教授、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江英副研究员、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副研究员。美方课题组由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斯先生担任。成员都是当代外交史学家，他们依次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普鲁森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历史系舒尔辛格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夏勒教授、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福特教授。双方课题组主持人及成员虽然来自中、美、英、加四国，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都主张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

双方商定，档案资料的使用重点，应该明确放在探讨每一个时期或每一重大事件中，中美两国真正利益的所在、当时两国领导人是如何认识国家利益、如何决策（决策过程）、决策实施及其预期效果的实现与否、当时的评价与最新评价。

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可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段不能算短的插曲，即李登辉访美事件。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这一事件给双方课题组成员的心理上都罩上了一层阴影，对双方的项目主持人压力就更大一些，不十分清楚这一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如何收场。不过，总体说来，恶化的形势不仅没有干扰课题计划的进行，反而加重了双方课题组成员的责任感。因为，他们都很赞赏邓小平的主张：“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①经过一年的研究工作，1996年9月双方就完成了各个子课题的初稿，10月份完成了论文的英译汉和汉

译英的准备工作，于当月末在北京召开了课题研讨会。同时，以论文评论员身份与会的还有：北京大学中美关系问题专家袁明教授和南京大学时殷弘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柯尔比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戈德斯坦教授。

整个研讨会气氛非常好，既坦诚直率，又热烈友好。与会者对每一子课题论文涉及或未涉及的每一事件、每一观点，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交流。最重要的成绩是互有启发，并达成许多难得的共识。这样，双方一致同意，把论文带回去修改定稿，进行再加工，然后发表。到了今年年中，修改后的论文陆续集中到了双方项目主持人手中。

毫无疑问，我们中方与会者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又从相互交流中获益匪浅。双方不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极有说服力地讨论和答复了对方提出的种种质疑。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种学术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我认为，经过研讨与论文加工，最重要的共识已经体现在双方的研究成果中了。这里，我只想选取一些重要的新观点，介绍给读者。

一、关于 50 年代的美中冲突，特别是朝战以后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普鲁森教授（美籍）写道：“要想得到问题的答案，分析 50 年代爆发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危机，很清楚，美国在亚太地区企图建立这样一种地区性格局——即最大限度地扩张美国的势力，同时急剧淡化中国的形象，竭力排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

响。”^⑤他还指出：“总之，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面对面地遏制中国的话，那么应当说它把这一政策推向了极端。尽管美国对苏联也摆出了一副遏制的架势，但是，它终究接受了苏联在东欧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美国对中国就不同。在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的时候，美国领导人甚至把中国港区内的水域也视为可以侵犯的领地。”^⑥由此，普鲁森教授的结论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华盛顿遏制欲望的性质，反而启发了人们把1954—1955年台湾海峡危机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美国的意图早在前一个世纪为实现其太平洋地区一个大国的梦想就形成了。英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不可一世的日本也威风扫地。像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那样的美国决策者们，不会甘愿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崛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就不可避免了。直到6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行动经历了惨重的失败以后，缓和的春风才微微吹来。”^⑦至于中国方面，罗伯特·罗斯教授则实事求是地写道：“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国始终奉行的是，坚决制止美国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⑧

二、关于越战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确实“接受”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即中美面对面的战争。他们被迫谨慎小心地制订每一步的战争升级策略并且取得了惊人准确的成功。但是，最后在结局中还是遭到了失败。正如罗伯特·舒尔辛格教授的专题论文结论说的：“从某种意

义上说,约翰逊政府做得不错,因为它估计到中国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来避免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險(并向中国传递美国想避免在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爆发韩战式冲突的信号)。然而,从战略角度上看,美国决策者却未能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中吸取更重要的教训,就是说,遏制中国并不是美国在越南打一场战争的足够充分的理由。”舒尔辛格教授认为,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最后的结果是灾难性的”。^⑨这就证实了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重要的主战派决策人之一的反思。他在最近写的一本书中坦率地说:“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参与过越南问题决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国的原则和传统行事的。我们是根据那些价值观做出决策的。然而,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我们应该向后辈解释原因。”^⑩尽管美国有一套“完美”的智囊体系和决策程序,但是,美国领导人也不免在政策抉择上犯错误,他们常常事与愿违,正如肯尼迪总统此前就担心过的那样,“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被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⑪在大国格局中,越南战争造成的具体后果是,美国非常想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苏联军事霸权主义和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损害。就是说,美国领导人当时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双重严峻的挑战来自苏联和日本,而不是中国。

三、关于中美缓和问题。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正是陷入越战泥沼,对如何抽身并无良策之际,而中国也面临着苏联的武装威胁。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决

定改变外交策略，集中力量应付苏联的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次政策调整。迈克·夏勒教授的分析是：“1969年至1970年，美国政府发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在此之后，1971年6月2日周恩来邀请基辛格来华安排总统访问。基辛格把这个消息描述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尼克松把这个邀请说成是‘世界均势根本转变’的结果，‘这种转变使得建立关系符合两国利益’。”^⑫这同尼克松的回忆录完全一致，尼克松的描述甚至更生动：“1971年6月2日……我接到了亨利·基辛格所说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接到过的最重要的来信……那天晚上……快到11点了，亨利突然冲进房间。他上气不接下气，我想他一定是从白宫的办公室一路跑着来的。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周恩来邀请我访华的信，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送来的……无论是亨利还是我在宴会上都是不喝酒的，但是这一次我们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干了杯，酒是很陈的白兰地……”^⑬

四、关于美国领导人与公众舆论的冷战思维问题。二战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说，更甚于对待苏联。罗斯玛丽·福特教授写道：“肯尼迪还特别关心中国核能力的发展，他和政府内其他官员相信，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莫斯科也同样关心此事：‘几乎可以肯定，莫斯科希望禁止中共获得核武器是苏联强烈支持监督核武器试验禁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话中，是这样形容中国的：‘七亿人口，斯大

林式的体制，核武器和决心以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说，美国面对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潜在的最大的敌人’。由于有这样的讲话，毫不奇怪，美国公众开始视中国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或者，美国将决定试图挖掘与莫斯科利益共同点，并寻求共同防止中国核武器能力进一步发展的方式。”^⑭

颇有启发意义的是，直至今日，这种对中国的冷战思维在美国是否依然存在？罗斯教授在其总结性前言中指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当前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讨论中所使用的各方面的统计数字。这些讨论类似于 60 年代美国对中国进行的评估……意识形态在美国人看中国时所起的作用，加剧了这种对中国实力的看法。作为仅存的由共产党治理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是美国对之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主要国家，由此就产生了对中国意图夸大的估价。”^⑮可以说，罗斯教授一语道破了当今中美关系还不能很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本合作项目的美方主持人罗伯特·罗斯教授。

罗斯教授是美国新崛起的一代中年学者之一。他多次来中国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国一贯持公正友好的态度，积极呼吁改善和发展美中关系。为此，他有许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例如，1995 年，他出版了专著《在谈判中合作：美国与中国，1969—1989》。^⑯1997 年，他同安·纳森合作，又出版了专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⑰第一部专著的中译本行将同我国读者见面。《长

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的中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并有报刊作了评介。^⑭另外，1996年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秋季号发表的《中国龙上场了》，竭力主张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1997年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了《北京：一个保守的国家》。在该文中，他列举种种事实反驳“中国威胁论”，论述当代中国并不是侵略扩张的国家，对邻国及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⑮这两篇文章在我国的刊物上都作过较详细的介绍。

罗斯教授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最近，西方的有关美中冲突的文献资料更倾向于强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楔子战略’中的实用主义和对中苏冲突看法的重要作用。……在美中冲突后期的多数时间里，中美两国的政策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的考虑。美中两国的决策者不是不可改变地追求针对所谓无法和解的敌人的革命目标，而是制订了敏感的和策略上适应性强的外交政策，调整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⑯出于历史的启迪，也出于前述他对美国当前意识形态的估价，他提醒读者注意说：“在我们进行这个合作项目的过程中，中美关系恶化了。本书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五六十年代延长和恶化美中关系的诸多因素，可能还困扰着冷战后时代的美中关系。它还表明，了解美中冷战冲突，可能有助于两国的决策者在冷战后避免不必要的和非预期的冲突。”^⑰

罗斯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学界相当多的一派人的看法。《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的

两位作者从美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较具体地谈到了当代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该书针对“中国威胁论”鼓吹者反驳说：“美国在同中国保持关系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利害关系。美国不依赖中国来保持实现南北美洲、欧洲、前苏联或中东的和平。它同中国合作的兴趣涉及到地区稳定和建立国际制度……美国的经济由于可以进入中国的市场而得益。建立有效的国际武器控制、贸易和人权制度，以及控制全球污染，都要依靠中国的合作。亚洲的稳定和美国削减防务负担，需要美国和中国之间不出现敌对关系。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两国都赞成俄罗斯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朝鲜半岛与柬埔寨保持稳定，保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以及保护中亚与中东不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侵袭。两国都反对日本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它们都赞成解决世界环保问题和发展世界贸易经济，尽管它们在这些方面的利益和代价有不同意见。在双边关系方面，美国早就表示真诚地希望中国繁荣和稳定。而中国也没有理由希望美国出现经济的或政治的动荡。双方都会由于对方的繁荣而获益。在文化和教育领域里，它们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双方受惠。”^②1997年2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③一书出版之后，在美国及其他地方“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重要时刻，罗斯教授的见解，确实给人以清新、公正、现实之感。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国内对上述两部代表作的种种评论。如，有的学者认为：“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反映了这场关于中国的辩论情况。（按，指‘中国威胁论’与反对‘中国威胁论’）它们就是

理·伯恩斯坦与罗·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和安·纳森与罗·罗斯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虽然作者们声称不能将他们归入遏制派或接触派，但很明显，伯恩斯坦和芒罗反映的是遏制派的观点，纳森和罗斯至少在表面上是站在接触派一边。然而，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一种已成为主流的共识，而在这共识之内，接触派与遏制派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本质的不同，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②为什么对《长城与空城计》会有这样的评价呢？我想，不外是纳森和罗斯教授主要从分析中国的实力出发，看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否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威胁。他们还不可能深入到新时期中国外交路线的本质来分析问题，对中国宣布的“永远不称霸”还心存怀疑。^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接触”比“遏制”好，“对话”比“对抗”好，因为，只有美中双方接触和对话，才有可能营造氛围，达成谅解和妥协；而遏制和对抗，却只能导致相互敌视，利益互损。

罗斯教授为本论文集写的总结性“序言”，很多观点和结论我都是赞成的。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我同他也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例如，正如本书论文中指出的那样，冷战时期发生的美中冲突，两国领导人都有各自的认识和估价，有时，也都不免有过分之处。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对于美国来说，所有的冲突都是发生在美国境外，美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威胁，不过是对它在世界或地区主宰地位的威胁罢了。而对于中国就完全不同了。饱受列强 100 多年残酷侵略宰割之苦的新中国，把维护本

国独立与主权完整放在首位，是很自然而又顺乎情理的。如果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出现威胁，中国领导人确实异常敏感，有时反应也有可能过分。“过分”是不好的，但是，中美两国的“过分”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现的。即使是在 60 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把国内的“反修”置于国家主权和安全之上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要求美国人具有中国人的切身感受。但在中美关系史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同样也不应该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这里不妨借用邓小平的话，道出它的实质：“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②⑥}这既是对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史的总结，更是对从 1949 年以来中美双边关系的实事求是的概括。顺便插一句，从中美关系缓和以来两国之间产生的风风雨雨，在中美两国的利益和联系日趋紧密的过程中，这些话就更有意义了。

如前所述，在这次合作中，增加共同语言是最主要的、最宝贵的成果。观点差异不可避免，我们要有耐心和信心，通过坦诚友好的交流去说服他们。实在说服不了也无妨，就让那些差异搁置在一边好了。

这次研讨与合作的另一重要成果是，西方学者感到，他们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还存在许多疑问乃至误解，希望继续合作交流下去。同样，中国学者也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合作研究。研讨会后，双方立即决定，下一个项目的主题应该是《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实

践：1949—1976》。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启动。我个人的最大期望是，将来继完成第二个项目之后，双方能够第三次合作研究一次《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我还要再次郑重地提醒读者，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每一个国家的学者研究问题，都离不开自己的这一背景和立场。中美学者交流的首要目的是寻找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或共同语言。差异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既要有清醒的估计和准备，又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

在西方，反对怪异的“中国威胁论”的有识之士正在日益增多，但他们立论的主要依据，还是中国的现实实力和中国的中短期发展战略。他们还不可能充分理解邓小平的和平外交理论及实践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本质的自然延伸。我们也不能这么要求他们。和平外交，为建立对整个人类（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奋斗不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色，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之后，这一点就更清楚无疑了。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相容的。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说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④但我们不能要